

英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的印度人移民*

罗圣荣,汪爱平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劳工移民,是导致今天的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拟分析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的由来、印度劳工的境遇以及印度移民社会的变迁等,并通过与同期的马来亚华人作比较,以揭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的特点。

关键词:马来亚;殖民时期;印度人

中图分类号:D73/77.338.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9)01-0074-07

东南亚的印度人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华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而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又是在东南亚所有国家里,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系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民族。关于对马来亚时期印度人的专题研究,目前国内仅见肖宏飞硕士的《英属马来亚种植园的劳工》(载《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3期)一文,该文主要介绍了英殖民时期马来亚种植园里印度人的经济状况。在国外对其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主要有 Sandhu, Kernial Singh 的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 - 1957)*, 该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来亚的印度人移民。但与同期情况类似的华人移民群体进行比较,以揭示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的一些特点的研究更是不曾见到。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冀引起对作为东南亚的第二大移民群体、马来西亚的第三大民族集团的印度人的更多关注。

* 收稿日期:2008-06-18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南亚民族史”(07BSS0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圣荣,男,江西遂川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汪爱平,男,江西遂川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独立以前的马来半岛一般称为马来亚。1948年,英国将它马来半岛的殖民地合并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其版图包括原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以及海峡殖民地中的马六甲和檳榔屿。新加坡仍属于英国直辖殖民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63年又与沙巴、沙捞越、新加坡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简称马来西亚。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

一、英殖民统治时期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由来

印度人与马来半岛接触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年,此后的1000多年里,印度大陆就不断有商人和僧侣涉足此地。尽管如此,在英国人干涉半岛事务之前,马来亚的印度人并不多见,只有一些少量的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在马六甲活动。由于人数少,在马来亚的印度人不得不操新居地的语言,努力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同化在此悄然进行,造成今天马来西亚为数众多的印度人却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人移民及其后裔的结果。

早在18世纪末,英国人已开始将其贸易利益从印度延伸至马来半岛。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随着马来亚锡矿的大量开采,大种植园的兴旺以及橡胶种植业的兴起,马来亚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但当地马来人却不能满足这种对劳工的巨大需求。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850年马来各邦只有大约30万人口,这么少的人口显然无法满足半岛开发的人力需求。^[1]何况马来人本身拥有土地,相对喜欢闲散的生活,因此极难说服他们到这些粗重及报酬低的工作领域里来。^[2]华人主要为改善经济地位而来,尽管欧洲的业主不断试图控制华人,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无法超越文化的障碍,华人劳工组织的影响力使欧洲人的企图屡遭挫折。^[3]欧洲和非洲的劳工因成本太高而不切实际,近在咫尺的爪哇人则在荷兰人的掌控之下。而英国本土在1833-1834年废除奴隶制以后,劳动力不足问题更显突出。基于上述原因,为填补劳动力不足问题,英殖民者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在此情况下与马来亚仅一水之隔的印度人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劳工队伍之源。

19世纪后半叶,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以及马来半岛殖民统治的进一步巩固,为印度人的大量移居马来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透过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机构,大批印度劳工有组织地被征募到马来亚,充当种植园以及各项市政工程的劳工。胡椒、甘蜜和咖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直接刺激了对印度劳工的第一次大需求。大量的印度劳工在“契约制度”与“凯加奈制度”的协助下涌入马来亚。1907年,因汽车充气橡胶轮胎的发明而导致橡胶价格大涨,马来亚橡胶园经济的蓬勃发展再次刺激了对印度劳工的巨大需求,以至于殖民政府直接卷入印度劳工的移民事宜,并于1907年直接建立了“泰米尔人移民基金”,以加速印度劳工移民的速度。^[4]对劳工需求的与日俱增和移民基金卓有成效的运转,马来亚的印度劳工移民从1909年的21963人次猛增至1913年的91236人次。^[5]

印度人移民马来半岛浪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才逐渐停顿下来,移民进入马来亚受到殖民政府的诸多限制。此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移民限制法的实施反而略显多余了。那时的马来半岛印度人口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的变化(见表1),到二战结束时马来半岛的印度人已达140多万人。^[6]

契约制度(the indentured system)是由印度的私人劳工招募机构负责的。他们与应招者签订种植园劳动的契约合同,一般最短期为3年。由于合同期限太长,而且招募的劳工很多是城镇居民,不适应种植园的工作环境,因而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从19世纪末开始,凯加奈制度(the Kangani System)开始盛行。“凯加奈”即“监工”(overseer)之意,他从自己的村子里招募劳工,为他们付旅费,然后再带领他们到自己的种植园里劳动。19世纪末以后,大部分印度劳工都是经由这种方式进入马来亚的。1907年,由于橡胶种植园对印度劳工的需求猛增,马来亚政府与种植园主联合设立了一项印度移民基金以资助招募工作,同时允许所有申请入境的印度劳工自由迁入。1922年,在印度与马来亚都设置了官员来管理印度人移民事务。这些措施采取之后,凯加奈制度就衰落下去了。参见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尽管马来亚殖民当局在战后试图努力恢复印度劳工的输入,以弥补在日据时期的劳工损失,但1947年印度的独立使得马来亚殖民当局的努力化为泡影。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热衷于国内外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他们认为劳工移民有损整个印度民族的尊严,因而禁止向海外移民劳工。而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即将取得独立的马来亚亦开始对移民实施严格的限制,踏上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仅仅限于那些专业技术人员。至此,印度劳工移民马来半岛实际上完全被中断了。^[7]

表1 印度人在马来亚所占总人口的比例(1891 - 1957)

年份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1957
占总人口比例(%)	5.0(a)	6.6(a)	10.1	14.2	14.3	10.3	10.6

注:字母 a 表示该数据为大约数。

资料来源:Sandhu, Kernial Singh,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London: Cambridge U. P., 1969, P. 200.

二、马来亚印度劳工移民的境遇

种植园劳工移民是马来亚印度人最为显著的特征。集中在各类种植园里的印度劳工构成了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主体。在1931年,80%的印度人属于劳工阶层,即便在1947年,所占比例也高达70%,其中,绝大部分又集中在种植园里。^[8]尽管殖民政府不断声称工资和待遇要比在印度好得多,然而各种证据表明印度劳工受尽非人的待遇。

种植园主们尽可能地压低工人们的工资,这种做法既是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也是为了达到控制劳工流动的目的。^[9]印度移民的工资待遇普遍低下,一个种植园里的成年印度劳工的平均月收入很少超过10-15马元,但从事相同工作的华工却能每月赚取30-35马元。^[10]这点微薄的收入也只能维持基本生计,略有一点节余。即便劳工能够度过各种难关,到最后也仅能挣够回家的路费而已。劳工持续不断的流入阻止了工资提高到本应有的高度,直到政府意识到有义务为劳工移民立法的时候。1912年和1923年分别通过的两部劳工法典在保护劳工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然而法律从未得到认真执行。^[11]从1920年开始,劳工们收入虽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衰退使种植园的就业率和工资待遇重新降至低谷,直到1936年经济复苏才有所好转。尽管如此,与同行的华工工资水平相比依然存在50-100%的差距。

每部移民劳工法律都规定雇主有义务为劳工提供住宅、医疗设施和卫生措施,但印度劳工的健康和住宿条件通常得不到充分关注。因贫困而背井离乡前往马来亚的旅程中印度劳工已饱受各种疾病侵害折磨之苦,他们中的幸存者发现迎接他们的是难以忍受的高强度劳作、低劣生活及各种致命的疾病。根据有关资料,1911年在森美兰州印度劳工的死亡率高达19.56%,整个马来亚的印度劳工死亡率为6.29%。^[12]1786-1957年,有多达120万的印度人因疾病、劳累过度或营养不良而导致非正常死亡。^[13]由于在职业的选择上殖民政府所设的种种限制,印度劳工即使没有债务缠身的

日本占领马来亚不久,即将6万名印度劳工送去修筑“死亡铁路”,生还者甚少。参见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见KSSandhu & A Mami, *Indians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166. 关于华工工资普遍比印度劳工高,这点在郭威白的《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一文中也得到证实并有详细的解释。

束缚也很少有机会改变自己处在社会底层的命运。非人的待遇、黯淡的前景,致使许多印度人将所剩无几的工资因成天沉迷于醉酒而挥霍一空,以至于回家的路费不够而滞留在马来亚,种植园里的印度劳工也因而被冠以“酗酒”的刻板成见。^[14]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劳工似乎很难逃脱此等悲惨命运的轮回。

三、马来亚印度人移民社会的变迁

英国殖民统治下初到马来亚的印度人,明显携有移民社会的一切特征,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1786-1957年间,大约有420万的印度人进入马来亚,但同期离开回国的却高达300万人,约占其总数的70%左右。而在1925-1957年间,返回率更是达到了80%。^[15]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人多为短期劳工,即使是那些非劳工移民很多也没有久留之意。这股返乡的浪潮随着马来亚经济的兴衰而起伏不定。

尽管如此,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1786-1957年已彰显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从以下3个方面就可以明显感知这种趋势的存在。

表2 1921-1957年马来亚华人、印度人土生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1921	1931	1947	1957
印度人	12%	21%	51%	65%
华人	21%	30%	63%	76%

资料来源:陈晓律等著:《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下的民主权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第一,土生印度人数目不断增加。从表2可以很清楚地察觉印度土生人口的变化。从该表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那就是不但是印度人,甚至连华人也开始由移民种群变为定居的种群。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变化,很多人开始视马来亚为第二故乡。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与华人,自然已经培育起对马来亚的认同感,对他们来说,马来亚已是故乡而非客土。由于本地人口已经可以提供可观的劳动力,对移民劳工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这也是印度劳工移民逐渐减少以致最终停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女性移民日渐增多。由于没有合适工作,以及居住设施简陋和时间上的限制(早期以契约制度移民马来亚的印度人工期较短,一般为3-5年),早期通过契约制度进入马来亚的印度人几乎系清一色的男性。例如,根据1891年的人口调查发现,当时马来亚印度人的男女比例仅为1000:18。此后,随着马来亚殖民地经济的急速扩张,更多的印度人蜂拥而至马来亚,致使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更为突出。由于长期没有家人的消息,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印度人因此不能组建家庭,造成马来亚印度劳工的工作积极性大幅下降,这也是导致印度劳工早期的性犯罪率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期待性别平衡问题的解决,可谓是广大马来亚印度人众望所归的事了。从1920年开始,印度政府开始关注印度移民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在多方努力协调之下,1933年马来亚殖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的外侨政策,这些政策没有限制妇孺的移入。这种情况下,印度劳工部门开始招募女性劳工或安排劳工家属移民马来亚,种植园里也相应开始为其安排一些合适的工作。马来亚印度人的性别比率因而大为改观,女性对男性的比率由1891年的18:1000变为1957年的

692:1 000。^[16]这说明已经有更多的印度人男女建立了核心的家庭,一个文化与种族更加趋于稳固的印度人社会已然出现在马来亚的大地上。

第三,移民社区渐趋成熟。印度人的家庭与土生印度人的与日俱增,都说明了印度劳工的流动性开始降低。初来乍到的种植园里的劳工,居住的是以棕榈叶、瓦片或波状的铁皮作为屋顶的单间简陋居所。随着种植园里的印度人建立的家庭不断增长,1935年后,这些房屋开始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村舍形的房屋——每个单元拥有4个单间,可供2个家庭使用,每家有各自的大门,彼此可以完全做到隔离,以保护隐私和降低疾病的蔓延。^[17]与此同时,为了稳固劳工队伍,回应外界对印度劳工触目惊心的死亡率的批评,一些有条件的大种植园里开始修建医院,关注印度劳工的健康状况,以降低其非正常死亡率。部分种植园的管理人基于欲吸引其种植园的工人家庭长期安顿下来,泰米尔文小学亦开始在种植园里兴办。印度劳工普遍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对宗教的狂热令他们在异乡也感到若没有宗教的场所来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心灵很难找到归宿。^[18]因而,在印度人的聚集地也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宗教的场所,如印度教寺庙、清真寺等。在潜移默化中,印度人已开始扎根于马来亚。村舍、医院、学校乃至寺庙,一切都见证了马来亚印度人社区一个成熟的发展历程,一个崭新的印度人社会在马来亚开始形成。

四、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印度人与华人的比较

在英殖民统治下同期大量移民马来亚的华人,在许多方面与印度人极为相似。他们都远离故土,一同沦为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发马来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饱受欧洲业主的剥削和摧残、欺骗和压榨,受尽非人的待遇。外国侨民的身份使他们虽身在异乡,却依然心向祖籍国,热切关注祖籍国的兴衰荣辱,积极支持本国同胞的革命斗争。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籍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对马来亚的政治并无多大兴趣。政治上认同祖籍国,视祖籍国为唯一的保护者,客居意识强烈。^[19]尽管如此,来自两个不同地域的移民群体,亦有诸多不尽相同之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的印度人与华人一样,鲜有扎根萌芽意识,一般都视马来亚为暂时的寄居地。一般来说,橡胶园里的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只居住三五年,就要返回家乡。到1921年,土生的印度人占印度人总数的12%,而同期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就已达21%(参见表2),印度人的土生率几乎只及华人的一半,远比华人士生率低。这说明,在第二次大战前,马来亚的印度人社会比华人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其次,社会结构的差异。印度人社会以宗教为团体、以民族为区分、以种姓为阶层的社会结构。宗教色彩异常浓厚,宗教的认同往往超越对民族的认同。印度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如此之深,以致有些印度人穆斯林宁愿把自己看作是马来人而非印度人。^[20]印度人移民马来亚,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因水土不服而消亡,它同样在马来亚的印度人社会生根萌芽。马来亚的印度人移民的主体是来自印度南方的泰米尔人劳工,他们几乎都是欧洲人的橡胶园工人。印度人的种姓制度,使属于低种姓的泰米尔劳工与来自印度北方、从事不同职业的锡克教徒、旁遮普人和古吉拉特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泰米尔人内部又分为许多次种姓。泰米尔人劳工在种植园内按照不同的次种姓分开居住。^[21]这种与生俱来而又泾渭分明的社会地位观念在马来亚的印度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宗教的差异、种姓制度的横行,导致马来亚印度人上下层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印度富人与泰米尔劳工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些都造成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四分五裂,形同散沙。

华人社会则与印度人社会大不相同,华人社会远没有印度人社会来得复杂。华人社会是以方言为类别、以血缘为纽带凝聚在一起。华人团体多为宗乡和宗亲组织,具有浓厚的家乡地域观念,

形成帮派团体。华人虽也并非一个匀质的整体,但与印度人的种姓团体的区别是,“帮”是不同方言集团的早期华人移民在有可能获得政治和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而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意识才是维系华人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华人宗教意识淡薄,纷繁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对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产生分化的作用。虽操不同方言,却都视自己为同一民族的成员。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共同的习俗与心理状态,使华人对本民族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社会上下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22]即使偶有冲突发生,也是利益博弈,绝非宗教使然。这些都与印度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马来亚印度人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种植园里的泰米尔劳工以泰米尔语作为他们通用的语言。但城市里的泰米尔人则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别,使得印度穆斯林、锡克教徒、旁遮普人与泰米尔人之间往来甚少,也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来亚各地出现数十个印度人团体,甚至互相对抗,但会员极少。事实上,马来亚的印度人独立前后都没能组成一个能代表全体印度人的全国性组织。^[23]

与印度人恰恰相反的是,马来亚的华人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都对悠久的中华文化怀有强烈的自豪感。即便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土生比例高,多受过英语教育,但也程度不同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在马来亚殖民政府对移民教育采取漠视态度之下,华人举社上下,齐心协力兴办华文学校。华语普通话在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流行,有效地消弭了各个方言集团之间的界限,华人社会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华公会的出现,尽管是在马来亚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组建,但它以维护整个华人社会的合法权益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成为独立前后马来亚华人社会的一面旗帜,得到广大华人的认可和拥戴。^[24]

五、结语

总之,英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亚劳工移民,是导致今天的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由于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马来亚的印度人开始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认同也从转向当地社会。他们与移居马来亚的华人一样,形成了东南亚的一个新的民族。

注释:

- [1] Victor Purcell, *Malay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71.
- [2] 王国璋:《马来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 - 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第25页。
- [3] 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王士录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 [4] Stenson Michael,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 18.
- [5][12] Loren S. Rytter, *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in Malaysia*, p. 10, <http://www.huaren.org/diaspora/asia/malaysia/race-his.html/2005-08-26>.
- [6] 王士录:《东南亚印度人概论》,《东南亚研究》1988年第3期,第61页。
- [7][8][10][13][15] KSSandhu & A Mani, *Indians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154, 166, 166, 154-155.
- [9][11][17] 肖宏飞:《英属马来亚种植园的印度劳工(19世纪中叶至二战前)》,《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3期。
- [14] 吴清德:《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马来西亚八打灵,1989,第44页。
- [16][18]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2, 66.
- [19][24] 梁英明:《战后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社会比较》,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36页。

[20][22][23] 梁英明:《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21] Rajakrishnan Ramasamy, *Caste Consciousness Among Indians Tamils in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4 .pp. 55-101.

[责任编辑:乔云]

Indian Immigrants in Malaya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Time

LUO Sheng-rong WANG Ai-p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Yunnan)

Abstract :The laborer immigration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tim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Malaysia today. This article is just to identify Indian immigrants'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origins, 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Indian immigrants, and also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Chinese in Malaya.

Key words :Malaya, colonial period, Indians

(上接第 73 页)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Waves from Southern Zhejiang :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LIU Y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from Southern Zhejiang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migration flow have shown a number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sofar a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s concerned. Based on fieldwork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Zhejiang with a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exhibited in different stages. It further observes current emigration from this region while probing into the different factors at work and the possible trend in the years to com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for those wh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regional history, as well as those who work on the curr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 :southern Zhejiang, waves of transnational e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